

从四个“五年计划”看周恩来辩证统一思想

杨 成 敏

(淮阴师范学院 政治系,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 周恩来在编制与实施我国第一至第四个“五年计划”过程中,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来认识、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给我们留下一笔丰富的思想财富。把握周恩来主持编制与实施四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思想特色, 对于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周恩来; 五年计划; 辩证统一; 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 F123.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02)04-0439-05

周恩来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 26 年国, 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从第一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草拟、审议到实施, 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 辩证地处理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矛盾关系。从四个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来看, 无论是在内容、速度, 还是方法的设计上, 都体现出周恩来辩证统一的思想特色。

一、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经济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 要遵循客观规律, 首先要摸准情况。早在 1950 年 3 月, 周恩来就指出: 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 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他坚决反对盲目行事, 不顾实际, 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1956 年, 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 周恩来反复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 “各部门订计划, 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 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 都要实事求是”, “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 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1]。周恩来认为, 不仅计划的编制要注重实事求是, 而且计划的实施同样要从实际出发。计划是人制定的, 人具

有主观能动性, 应当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它必须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 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 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关于八大建议的数字, 这只是个建议, 是可以修改的”, “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 这实际上行不通”, “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 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 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1]。这就是说, 要把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实践证明, 遵循了这一原则, 计划就能得到有效的实现, 相反, 违背了这一原则, 计划则无法成功地实施。

二、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改善

周恩来向来主张,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1952 年, 周恩来在其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中写道, 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 其基本任务是: 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2]。1956 年,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 周恩来明确提出: “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

收稿日期: 2000 11-10

作者简介: 杨成敏(1973), 女, 江苏徐州人, 淮阴师范学院政治系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当然是不够的,必须继续加强,但是我们目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把它同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3]周恩来一直认为,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割裂,他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3]周恩来在总结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磋商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忽视人民生活福利。在 1962 年 3 月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要先搞五年计划,再搞十年规划,为此首先要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伤筋动骨”的压缩的观点时,周恩来插话道:“可以写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4]之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赞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要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的问题,摆好农、轻、重的次序。

周恩来主张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1956 年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勒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3]。所以,从 1964 年起,周恩来在负责组织和审议“三五”计划草案时,进一步提出了“先抓吃、穿、用,兼顾国防,实现农、轻、重”的思想。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同时对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三、坚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协调发展的综合工程。单径独进地抓经济发展,往往会事与愿违。周恩来不但注重编制“五年计划”的严谨、细致,“积极稳妥”,还特别注意“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在“二五计划”实施期间,他反复强调计划要“全面安排”,注意“综合平衡”。

针对国民经济计划实施前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现状,周恩来主张坚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统一。早在“一五计划”实施前的 1952 年 10 月,周恩来即指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象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5]为此,周恩来反复提醒全党认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统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我们要建设,而培养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他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5]培养干部、人才,正是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一主要任务的主力军则是知识分子,而当时知识分子“不是太多了,而是少了”^[6],进行“恢复和建设”工作,马上就感到知识分子不够”^[6]。因此,要大力发展教育。1952 年 7 月,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 146 次政务会议时,提到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兼顾问题,他指出:我国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又是教育、卫生当先。教育方面的问题,一是普及,一是提高。在提高方面,一是培养大批的知识分子,一是提高现有知识分子。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展,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部门”^[6]。周恩来认为,教育不仅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还是整个四化建设的基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没有教育和人才的规划是不全面的。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前,周恩来再次强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进行国家建设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就必须努力培养建设人才。”^[5]1956 年 9 月,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增写了:“应当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6]

当然,重视文化建设,也必须从实际出发。大力发展不等于盲目乱上,这里也有一个适应国情的问題。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统一。1962 年 1 月周恩来在修改中央工作会议报告稿中的经验教训时增加了第一条,即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不能过快”^[7]。周恩来的这一辩证思想,帮助人们克服了认识上的片面性,使我国在几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坚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统一,这一高瞻远瞩的主张,成为我们今天“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主要

思想基础,它仍然是我们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当遵循的指导原则。

四、农业建设与工业建设

在几次编制“五年计划”中,一直存在着如何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问题。对此,周恩来始终坚持二者的统一。他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3]他还特别强调:“谁忽视了农业和农民,谁就要犯错误。”^[3]在“一五”计划实施期间,周恩来强调指出:“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1]因此,“必须正确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3]。他认为计划工作中,必须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确保农业和工业协调一致发展。“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3],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周恩来指出:“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关系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3]“一五”期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是协调的。“二五”期间,没有处理好,1960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加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23.6%;在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2.2倍,而消费资料产值却只增加47%,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尽管周恩来1957年10月仍就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强调: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如果农业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发展就将被拖后腿^[7],然而,“二五计划”未能有效实施,“以钢为纲”、“超英赶美”的思想导致“二五”期间出现了工农业失调的结果。为此,周恩来总结了经验教训,1962年12月,他在《吸取经验教训,做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两者

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总的方向是要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都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只有基础发展了,工业和其他部门才能发展。”^[7]由于周恩来的这些明确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效地避免了前苏联发生的错误,少走了弯路。

五、宏伟目标与分阶段实施

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上,周恩来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而又稳步前进的方针,主张把宏伟目标与分阶段实施相结合,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相统一。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决策^[6]。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我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宏伟目标^[3]。他认为,既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利条件,又要正视前进过程中诸多制约因素,脚踏实地地工作,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实施。对此,周恩来在“二五”至“三五”期间,多次阐明“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循序渐进地实现”的观点。1956年9月16日,在中共“八大”所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周恩来对有步骤分阶段实施的意义作了说明,他指出: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3]。

针对分阶段实现宏伟目标的具体步骤,周

恩来分别在 1963 年和 1964 年两次作了详细阐述。1963 年 9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国民经济计划时指出:三年过渡之后,我们打算搞一个 15 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或工业体系。然后,再有 15 年左右,在 20 世纪内,建成一个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事情非常重要^[7]。1964 年 12 月,对于上述观点他再次作了阐明。这就把树立宏伟目标与脚踏实地的努力步骤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避免了盲目乐观、急躁冒进的倾向,又克服了不思前进、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从而确保每个年度,每个“五年计划”能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逐步向大目标靠近。这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重要的经验之一。

六、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

周恩来认为,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周恩来在主持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和实施结果的首要一条经验,且被党的“八大”正式肯定了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 年 2 月周恩来就明确指出:“经济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针对某些领导者头脑发热现象,周恩来指出:“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的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1]1956 年 6 月,周恩来在发现急躁冒进的倾向有所增长时,及时提醒说:“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1]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非常注意这一点,据王光伟回忆说:“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的数字各方面都是经过反复平衡的,都是

总理呕心沥血考虑的,他不仅过问每一个数字……连文字都是他亲自定下来的……总理对建议数字和基建项目都亲自审查,特别是重大项目是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专家意见才确定的。”^[8]然而,在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的冲击下,“二五”计划建设的报告被抛到九霄云外,“大跃进”使党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1960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中无限感慨地说:“1956 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9]后来,周恩来在 1967 年 2 月 7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对“二五”期间出现的大跃进批评道: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必须认识到,如果不按比例,不搞综合平衡,不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7]。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的统一,才能科学地编制出有利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计划,牢牢掌握实施计划中的主动权。

七、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对前苏联有一定的依赖性。例如,1952 年 6 月,周恩来、陈云领导中财委根据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勾画了《1953 年至 1957 年计划轮廓草案》。可是,由于缺乏经验,这一草案十分粗糙,有的地方甚至连一些计划的专用名词都没有弄清楚。因此必须虚心向前苏联政府请教并学习其经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得到苏联的帮助。据《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国民经济的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 91 个工业项目,加上 1950 年签约的 50 个和 1954 年 10 月又增加的 15 个,共 156 个项目。同时苏联也派了许多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建设。但是,在依赖苏联的同时,我国充分注意到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

本立脚点”,“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当然,“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3]。独立自主决不意味着排斥外国的帮助。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但决不能将二者割裂开,走向两个极端。1956年9月周恩来在经济工作报告中指出,“进行建设可以依赖外国援助,不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想法是错误的”;“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他还指出:“由于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力量日益增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3]他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我们固然以自力更生为主,但还要以争取外援为辅”^[10]。

周恩来主张学习外国一切长处,但应遵循“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的原则和“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1972年2月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批示同意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时强调,对引进技术,只能“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改革创新^[11]。周恩来的这些真知灼见早已被实践所证明,是今天和将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仍应坚持的重要思想。

此外,周恩来在领导制定“五年计划”过程中,还十分注重上下结合、领导负责与群众参与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是党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我们的工作就能顺利

进展,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反之,就会遭遇曲折甚至失败。周恩来在领导编制和实施四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在新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大,关系更复杂,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为武器,对于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颇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51-253;233;289;251;252;263.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文件: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55.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44;142;230;10;9;440;371;231-232;132-133;219;440-441;226.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14.
- [5]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恩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71;71;140;577-578.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37;137;251;615;130.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52-453;84;520;455.
- [8] 王光伟.周恩来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A].怀念周恩来[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3.
- [9]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82.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12-439.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11.

Zhou Enlai's Thought of Dialectical Unity in the Four Five-year Plans

YANG Chengm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Huaian 223001, China)

Abstract: In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first four five year plans, Zhou Enlai stuck to dialectic ideas of Marxism and applied them to understanding and solving a series of major problems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left us a rich legacy of thought. It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master the features of Zhou's thought in his presidency of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four five year plans.

Key words: Zhou Enlai; five year plan; dialectical unity; economic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张超